

“雅志不得施”之后的“冲净”

——嵇康《述志》诗中的心路历程

叶当前

(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 安徽安庆, 246052)

摘要: 嵇康两首《述志》诗, 排比意象, 寓物述志, 表面写游仙、求隐, 实质是求索咏志, 既是对传统诗学言志精神的传承, 又是对老庄、儒家处世方式的思考, 展示了“雅志不得施”到“冲静得自然”的心路历程。

关键词: 嵇康; 《述志》; 雅志; 求隐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4)03-0192-05

嵇康两首《述志》诗, 排比意象, 寓物述志, 表白自己“雅志不得施”到“冲静得自然”的心路求索轨迹, 是研究嵇康思想的重要文献, 值得深入剖析。

关于嵇康《述志》诗的写作时间, 殊无定论。侯外庐等编《中国思想通史》根据诗中“轲丁悔吝, 雅志不得施”“恨自用身拙, 任意多永思……往事既已缪, 来者犹可追”等句考证此诗为诗人入狱后作。上文考证《幽愤诗》作年时, 确定嵇康入狱为景元三年^{[1](162)}。据此, 则《述志》诗作于景元三年(262)。韩格平、皮元珍、曹旭先生等从之, 并提倡与《幽愤诗》对读。庄万寿则认为侯外庐引以为证的诗句“其实这里只是很含蓄说自己坎坷不如意, 目的是向司马昭表白自己要追求新的开始, 要脱离政治、社会, 去过一个与世俗隔绝的仙道生活, 也就是要司马昭放心, 所以《魏氏春秋》说有‘绝世之言’。而且文句平和, 与狱中作的真诚期待的《家诫》及激愤绝望的《幽愤诗》截然不同。可能《述志》诗是嵇康在时局紧张, 拒绝应召, 躲到河东, 避免嫌疑的表白诗, 叙述自己向往山野自然的志向, 所以叫《述志》诗。”故庄氏系此诗于甘露二年(257), 时年嵇康 34 岁, 避地河东^{[2](177)}。此年嵇康与二郭有赠答送别诗, 其中表达了嵇康与二郭迥然不同的人生志向, 特别是远离尘嚣的求仙求隐之志, 与《述志》诗若合符契。因此, 《述志》诗当可与此对读。相较两种说法, 结合诗歌文本, 笔者倾向于庄氏说法。

根据《三国志·魏书》注引《魏氏春秋》, 嵇康避

地河东事排在钟会造访嵇康衔怨事后, 置于嵇康与山涛绝交之前, 曰:“大将军尝欲辟康。康既有绝世之言, 又从子不善, 避之河东, 或云避世。”^{[3](606)}此事前后, 嵇康都做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过激举动, 此期则是嵇康徘徊于雅志与隐逸之间的一段矛盾时期, 《述志》诗及其与二郭的赠答送别诗言及于此。

一、“诗言志”与嵇康的“雅志”

“诗言志”是中国古代诗学开山纲领, 朱自清《诗言志辨》分“献诗陈志”“赋诗言志”“教诗明志”“作诗言志”四大类型考察中国古代诗与志的关系^[4]。对于中国古代诗学中“志”的深刻内涵, 杨树达、闻一多、朱自清等学者在训诂的基础上结合古代诗学作了细致考辨, 陈伯海在朱自清《诗言志辨》的基础上接着说, 以发展的眼光阐释古代诗学中的“志”:“‘诗言志’中的‘志’, 孕育于上古歌谣、乐舞及宗教、巫术等一体化活动中的祝咒意向, 并经礼乐文明的范铸、改造, 转型、确立为与古代社会政教及人生规范相关联的怀抱。”将“诗言志”拓展到“诗言怀抱”, 认为“这一怀抱的具体内涵, 又由早期诗人的用讽、颂以‘明乎得失之迹’, 发展、演变为后世作者的重在抒写‘一己穷通出处’和‘情寄八方之表’, 其间分别打上了诗、骚、庄的不同思想烙印, 从而使‘诗言志’的命题变得更富于弹性, 乃能适应后世人们丰富、复杂

收稿日期: 2013-12-15; 修回日期: 2014-02-2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六朝送别诗研究”(13FZW058);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诗品》《文心雕龙》之比较研究”(11BZW019); 安徽省社科规划项目“嵇康文学研究”(AHSKF09-10D61)

作者简介: 叶当前(1972-), 男, 安徽太湖人, 文学博士, 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魏晋南北朝文学

的生活感受的表达需要。”^[5]这便将中国古代诗人的“志”在诗教的主流上开掘出骚、庄一路，引出超世之“志”。这种超世既有儒家的独善其身、功成身退，又有道释的跳出尘俗、隐逸求仙。“志”的这种衍变分派从萧统《文选》选录篇目可窥一斑。《文选》赋类专列“志”目，选录班固《幽通赋》、张衡《思玄赋》《归田赋》、潘岳《闲居赋并序》，为言志一类确立典范。这一类赋所体现的“志”在陆机《遂志赋·序》中便有品评：“昔崔篆作诗，以明道述志，而冯衍又作《显志赋》，班固作《幽通赋》，皆相依仿焉……班生彬彬，切而不绞，哀而不怨矣。崔、蔡冲虚温敏，雅人之属也。衍抑扬顿挫，怨之徒也。岂亦穷达异事，而声为情变乎！”^{[6](15)}班固、崔篆、蔡邕等人的言志赋符合中庸的审美标准，为“与古代社会政教及人生规范相关联的怀抱”，属于明道述志一类，而冯衍赋缘怨，因怨言志，声为情变，属于抒写“一己穷通出处”一类。陈伯海概括说：“超世之‘志’渗透于文学作品，当以《楚辞》中的《远游》《卜居》《渔父》诸章为较早。东汉班固《幽通赋》的‘致命遂志’和张衡《思玄赋》的‘宣寄情志’中，亦能找到它的痕迹。诗歌作品言超世之志的，或可以汉末仲长统《见志诗二首》为发端，得魏末阮籍《咏怀》的发扬光大，到东晋玄言诗潮形成巨流，而绵延不绝于后来。”^[5]

诗言志是中国古代诗学的传统，而赋体、诗体纷纷以“志”称题，明确表达述志的意思，可以说是一种新变。东汉郦炎“大道夷且长”及“灵芝生河洲”两首诗，《广文选》与《诗纪》均题名“见志诗”，与两首诗中豪气干云、企慕远大的志向相一致。《后汉书》本传载：“灵帝时，州郡辟命，皆不就。有志气，作诗二篇。”^{[7](2647)}钟嵘亦谓：“文胜托咏‘灵芝’，寄怀不浅。”^{[8](471)}诗人运用丰富豪迈的意象寄托远大的志气和抱负，古劲质直，梗概多气。张华《励志诗》虽在儒、道两可之间徘徊寻找人生的出路，但最终回归到“复礼终朝，天下归仁”，其儒家之志博雅可观，仅从言志方面看，可以归入郦炎一派。

仲长统《见志诗二首》则表达出与郦炎完全不一样的“志”。《后汉书》本传谓：“每州郡命召，辄称疾不就。常以为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扬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灭，优游偃仰，可以自娱，欲卜居清旷，以乐其志，论之曰：……又作诗二篇，以见其志。”^{[7](1644-1645)}《见志》诗二首表达的是卜居的乐志，要求遗落人事，恣心所欲，祛除百虑，离愁忘忧，散弃“五经”“风”“雅”、诸子百家，最终进入悠游境界，即“抵志山栖，游心海左。元气为舟，微风为楫。敖游太清，纵意容冶”^{[7](1646)}。仲长统描述的这种超世自

乐之志追求身心自由，深受老、庄影响，但又弥漫着儒家独善的田园娱乐思想。嵇康《赠兄秀才入军》想象“垂纶长川”“手挥五弦”“游心太玄”的境界与仲长统笔下“卜居清旷”的场景可以互文对读，其《述志》诗二首亦受到仲氏《见志》诗二首的影响。

在《述志》诗中，嵇康起势便托出自己企慕治世的雅志：“潜龙育神躯，濯鳞戏兰池。延颈慕大庭，寢足俟皇羲。”^{[9](35)}潜龙在渊，濯鳞兰池，延颈企盼大庭氏、伏羲氏之世“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已”的理想治世^{[10](262)}。然而现实是残酷的，老庄小国寡民式的理想社会并未出现，反而是杀戮纷争，世道险恶，士人僚吏朝不保夕。嵇康并未像建安诗人那样直笔描写这种混乱社会现实，而是像屈原那样上下求索，其结果只能是“庆云未垂景，盘桓朝阳陂”“殊类难遍周，鄙议纷流离。轘轲丁悔吝，雅志不得施”。从前半段可以看出嵇康的雅志既不是屈原那种亲身治世、施展才能的大志，也不是宁越、苏秦那种经过刻苦努力而实现宏图大志的理想抱负，而是期盼回归老、庄式无为而治的上古社会之志，这种雅志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建立在当时纷乱的社会现实基础上，因此不难看出嵇康的忧世之志。

何晏等人的言志则与嵇康大相径庭。《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名士传》：“是时曹爽辅政，识者虑有危机。晏有重名，与魏姻戚，内虽怀忧，而无复退也。著五言诗以言志。”^{[11](654)}逯钦立辑何晏《言志》诗两首及两残句。据《世说新语·规箴》“何晏、邓颺令管辂作卦”条载，何、邓因令管辂卜测是否位至三公，管辂虽交疏却言诚，援引古义深戒二公，何晏“因辂言，惧而赋诗”^{[11](654)}，诗中以鸿鹄担忧罗网比喻忧祸难料，浮云、灰尘蔽障目比喻世事难以看透，故只能退求其乐，像浮萍、转蓬一样随波逐流、随风飘荡，逍遥志意，及时行乐。字里行间流露出何氏惧祸忧生之志，无暇顾及社会未来的发展。但正如《名士传》所言，何晏并不真正思虑退守，而是谋求是否位至三公，诗歌言志与个人野心悖反而驰。与嵇康的雅志相较，二者自有境界高下之分。

嵇康的雅志也不同于稍后陆机等人的功成身退之志。陆机《遂志赋》在遍察前人述志文的基础上抒发自己的志向：“随性类以曲成，故圆行而方立。要信心而委命，援前修以自程。拟遗迹于成轨，咏新曲于故声。任穷达以逝止，亦进仕而退耕。庶斯言之不渝，抱耿介以成名。”^{[6](15-16)}倡导言出必行、光明磊落、功成身退，迥异乎嵇康以老、庄为旨归的超世之志，可

以与左思的“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归于一类，属于以儒家立德、立名为旨归的超世之志。

钟会说嵇康“轻时傲世”^{[11](407)}，向秀《思旧赋序》说“嵇志远而疏”^{[12](720)}，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说：“嵇志清峻”^{[13](65)}，表述虽异，却都指出了嵇康政治志趣“远”的特点。轻时即轻视当代时政，傲世即傲视当代现状，脱离当代，上跻远古。而“远而疏”“清峻”等既指嵇志清高，风格峻朗，亦指嵇康推尊的理想社会在远古时代，而且一直要上溯到大庭、皇羲时代，比曹丕的“宪章有虞”时代更远。嵇康追踪远古，内有老、庄思想基础，外有正始时代思潮的影响。王葆玟总结说：“曹魏黄初到正始的政界一直有‘追踪上古’和‘取法三代’两派意见。‘取法三代’一派主张进行‘改正朔，易服色’等形式上的变革，‘追踪上古’一派主张实行实质的改革而对‘改正朔’等事不感兴趣。‘效法三代’一派以五行三统的政治法则为依据，‘追踪上古’一派则背弃这些法则而另找根据。‘效法三代’者的五行三统法则以宇宙构成论中的阴阳五行说为理论基础，‘追踪上古’者则以玄学或形上学为理论基础。”^{[14](86-87)}嵇康作为正始玄学的代表人物，不满当时社会现状，又不满于曹魏那种换汤不换药的理论腔调，因此在其老、庄式雅志的背后深蕴着变革社会的超世之志，与其玄学思维密不可分。这从其《太师箴》中可以得到印证。

在《太师箴》中，嵇康认为天地之初的太素时期“厥初冥昧，不虑不营”，处事都是凭自然之情，君道亦出自然，“芒芒在昔，罔或不宁”；到了皇羲时期，则“静默无文，大朴未亏。万物熙熙，不夭不离”；唐虞时期“体资易简，应天顺矩。絺褐其裳，土木其宇”；舜禹时期则出现了王者劳累，百姓安逸，子州支父、石父之农、许由等以各种理由逃避继位的现象，“先王仁爱，愍世忧时；哀万物之将颓，然后莅之”。至此以后，则德益衰，大道沉沦。此时的社会状况是：“智慧日用，渐私其亲。惧物乖离，攘臂立仁。利巧愈竞，繁礼屡陈。刑教争驰，天性丧真。”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社会则继续丧真失本，“季世陵迟，继体承资。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故君位益侈，臣路生心。竭智谋国，不吝灰沉。赏罚虽存，莫劝莫禁。若乃骄盈肆志，阻兵擅权。矜威纵虐，祸崇丘山。刑本惩暴，今以胁贤。昔为天下，今为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丧乱弘多，国乃陨颠”^{[9](310-311)}。按照嵇康的历史发展观，从舜禹时期开始出现仁爱的现实，居王位者不得不愍世忧时，为百姓谋虑，开始逐渐与自然乖离。到大道沉沦之际，人的私利越来越重，不得不用仁、礼、刑等来规范人的行为，导致天

折本性，丧失本真，远离自然。这种认识与老子的观点一脉相承，即所谓“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15](134)}。而到了末世衰落阶段，统治者不顾百姓利益，以天下奉其一己之私，故帝王不道，残暴之极，就会导致人民的反抗，最终自取灭亡。嵇康虽然选取的时代比较久远，但其所谓“季世陵迟”却有一直延续到现代社会的趋势，讽世意味昭彰可见。他在《述志》诗中钦慕大庭、皇羲时代，正是上古一切顺其自然的时代，大朴简易，应天顺矩。这又与《周易·系辞上传》天地宇宙易简观念相一致，即“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简则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16](229)}。因此，嵇康雅志所向的理想社会有其深邃的玄学思想基础。

总之，嵇康《述志》诗所谓“雅志”是其在玄学理路上推演出来的社会变革大志，但嵇康本不过是一位思想家，而非政治家，要回归上古社会的宏大理想，仅凭《太师箴》这样的几篇文字无法改变统治者的认识，“雅志不得施”是必然的，嵇康对此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因此，《述志》诗很快就转向隐逸之志。

二、“冲静”——嵇康“雅志不得施”之后的选择

嵇康的隐逸之志在《述志》诗中表现为游仙与隐逸两种方式，在其一后半段说：“逝将离群侣，杖策追洪崖。焦鹏振六翮，罗者安所羁？浮游太清中，更求新相知。比翼翔云汉，饮露滄琼枝。多念世间人，夙驾咸驱驰。冲静得自然，荣华安足为！”^{[9](36-37)}在雅志不得施的现实中，嵇康决定离开朋友，离开世俗社会，去追寻传说中的神仙洪崖，像鸚鵡一样遨游太清，又像比翼鸟一样遨游云汉，吸风饮露。最终令尘世罗网无处可施，人间荣华不足为道，过上冲静自然的逍遥生活。陈祚明评曰：“超旷沈郁，俯视六合，特愤世之辞，一往太尽，都无含蓄婉转。”^{[17](231)}陈氏理解嵇康求仙实为愤世，是在抒发雅志难酬的激愤之情。即便是嵇康专门述写游仙学道的《游仙诗》，陈祚明也认为乃“轻世肆志，所托不群。非真欲仙也，所愿长与俗人别耳”^{[17](231)}。“长与俗人别”，不以是否位及三公、轩冕在身为志，而是回归自然，返归上古，离群求仙的最高境界是“冲静得自然”，嵇康此志默契《庄子》关于古时得志之论，《缮性》篇比较古今之志说：“古之所谓得志者，非轩冕之谓也，谓其无以益其乐而已矣。今之所谓得志者，轩冕之谓也。轩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傥来，寄者也。寄之，其来不可圉，其去

不可止。故不为轩冕肆志，不为穷约趋俗，其乐彼与此同，故无忧而已矣。今寄去则不乐，由是观之，虽乐，未尝不荒也。故曰，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也，谓之倒置之民。”^{[10](408)}按照庄子的意思，如今所谓得志只是贪求荣华逸乐，自我被物欲所蔽，本性被世俗所蒙，本末倒置。古代所谓得志是指达到无以复加的快乐自由。嵇康所向往的正是这种鄙弃荣华、冲静自然的理想状态，按其本来的想法，是希望整个社会达到这种境界。

事实上，不但社会不可能达到自然的境界，就是嵇康个人也无法达到自适的状态。求仙不能，只能转向求隐。《述志》诗第二首曰：“慷慨思古人，梦想见容辉。愿与知己遇，舒愤启其微。岩穴多隐逸，轻举求吾师。晨登箕山巅，日夕不知饥。玄居养营魄，千载长自绥。”^{[9](38)}向古人学习，隐逸岩穴，玄居养生，过着神仙般的生活。嵇康撰有《圣贤高士传》，嵇喜撰《嵇康传》曰：“超然独达，遂放世事，纵意于尘埃之表。撰录上古以来圣贤、隐逸、遁心、遗名者，集为传赞，自混沌至于管宁，凡百一十有九人，盖求之于宇宙之内，而发之乎千载之外者矣。”^{[3](605)}圣贤、隐逸、遁心、遗名的高士，正是嵇康所向往的。可惜《圣贤高士传》早已散佚，戴明扬辑得广成子、襄城小童、巢父、许由、壤父、善卷、石户之农、延陵季子、长沮、桀溺、狂接舆、原宪、庄周、段干木、荷蓑丈人、范蠡、鲁连等 69 人，这些人都是鄙弃功名利禄、功成不受爵、遗世独立之士，嵇康为之作传写赞，不难看出其思想倾向。嵇康与当时隐逸名士王烈、孙登亦有不同寻常的交往，可作实证。然而，像嵇康这样龙性难驯的思想家，是不可能真正长居深山岩穴隐逸的，即便其身在山阳百家岩，他的声音总是不断传到洛阳去，引起赵至等人的追慕，引起钟会等人的警觉。

《庄子·缮性》说：“隐，故不自隐。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10](405)}庄子认为隐士都是时代造成的，需要待时而动，二郭、阮侃赠诗便对嵇康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但嵇康与这些朋友志趣迥异，在时命乖谬之际，亦做不到隐而不发。嵇康《卜疑》所假托的那位宏达先生已经做到超世独步、怀玉被褐、机心不存、泊然纯素、遗忘好恶的境界，然而在不当时命的社会现状下，不禁提出一系列疑问，竟不知何去何从。屈原流放，心迷意惑，而作《卜居》，质疑于蓍策，詹尹给出的回答是：“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

行君之意，龟策诚不能知事。”^{[18](178)}嵇康困惑于时，借宏达先生卜疑于太史贞父，得到的答复是：“吾闻志人不相，达人不卜。若先生者，文明在中，见素抱朴。内不愧心，外不负俗。交不为利，仕不谋禄。鉴乎古今，涤情荡欲。夫如是吕梁可以游，汤谷可以浴；方将观大鹏于南溟，又何忧于人间之委曲！”^{[9](142)}两者的回答相异，但均有不愧内心、忠贞执念的意思，相对庄子“深根宁极而待”的存身之道又迥乎不同。嵇康善辩，但在内心深处，矛盾困惑令叔夜自己也无法解答。求仙寻隐对应的是全隐，待时而动对应的是半隐，无愧于心对应的是自然。在人生的历程中，嵇康徘徊于这三种生存境界之中，最终决定纯任自然，最终铸就了叔夜独特的思想品格。

三、余论

嵇康家世儒学，但少年失怙，由母兄鞠养，培养了其自由思想，虽熟习儒家经学，却更好老庄。儒学的无意识与老庄的有意表现，犹如嵇康人格结构中的超我与本我，一方面有着伟大的社会理想，如其《六言诗》咏叹尧、舜治世，盛称隐于朝的东方朔、隐于野的老莱子之妻、甘于贫困的原宪、淡泊爵禄的楚国子文与鲁国柳下惠，这虽不是嵇康“雅志”所期盼的上古理想社会，却是当代社会的理想人格。这些历史人物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咏史诗及历史人物赞称颂的那些或建功立业、或杀身成仁的人物并不相同，而又只有原宪得入《圣贤高士传赞》，可见嵇康在当代社会语境下摇摆于儒、道家之间，儒学是隐性的，老庄思想是显性的。老庄思想落实到世俗社会方面，便生成嵇康回归上古的强烈愿望。故另一方面，嵇康又以世俗化的老庄思想作为雅志的标志，他甚至在《赠兄秀才入军》诗中悬想悠游的诗意生活。因此，可以认为嵇康“雅志”的实质是儒家的，却希望以老庄的方式表现出来。但这种老庄方式在嵇、阮两人身上的表现迥乎不同，阮籍表现为强烈的反礼教行为，在政治方面则常常醉酒装糊涂；嵇康则表现为强烈的怀疑精神，常常以各种论辩文间接表达政见，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结果是直接冲击了政治红线。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反礼教并不真正碍事，冲击政治却是要命的，嵇以杀身、阮以寿终大抵以此。因此，嵇康在追求“雅志”的过程中，危机总是若隐若显，此次避地河东亦是敲了一次警钟。离别之际，二郭赋诗送别并劝嵇康权衡变通，可知嵇康朋友圈早就研究过“雅志”问题，自然也激起叔夜对雅志、求隐、自然三种处世方式的思考，结

果便是“冲静得自然”，因此，从“雅志”到“自然”是嵇康在人生历练之后决定要求索的人生境界。

然而，这种求索注定是痛苦的折腾。黄省曾《嵇中散集序》概括嵇康求隐与其生活著述的关系，可以为嵇康的求索注脚，其曰：“以涂匱寡欢，故泽和于琴绮；以都井暄鄙，故缀宅于山阳；以产务不足综，故寻炼乎九鼎；以俗子不足侣，故开襟于七贤；耻爵组之竞驰，故表传乎高士；卑天位之窃履，故托箴乎太史。揆厥玉度，盖欲猎华缨于伏、轩之署而调管籥；乘绿车于尧、虞之庭而览凤皇者也。”^{[9](341)}

虽然付诸行动，但自然这第三条路线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是由于嵇康诗性人格决定的。嵇康追求诗意的人生，打铁、清谈、垂纶、弹琴、书法、绘画等，都已经艺术化，审美化。但这些都与政治毫无干系的诗意生活却无不打上政治烙印，锻铁却得罪了钟会，清谈论及的内容翻了历史的公案，清谈朋友圈埋下了日后绝交的导火线，弹琴演奏的《广陵散》亦蕴含着杀气。这就是诗人嵇康，不知变通，也不愿意变通，表面很谨慎，避地隐居，实际却不断托物言志，不但不愿意跟别人唱赞歌，而且总不小心让自己的声音传播出去；熟悉传统，却不断挑战权威；虽然明白东方朔和稀泥、阮籍装糊涂的好处，自己却总是做不到。因而理想归理想，行动归行动，施展“雅志”做不到，“冲静得自然”也做不到，两方面都做不到，这就是

诗人化的悲剧。嵇康想象的第三条路线也只能在雅志与隐逸之间不断摇摆。

参考文献：

- [1] 侯外庐,等. 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7.
- [2] 庄万寿. 嵇康研究及年谱[M]. 台北: 学生书局, 1990.
- [3] 陈寿撰. 裴松之注. 三国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4] 朱自清. 郭国平讲评. 诗言志辨[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8.
- [5] 陈伯海. 释“诗言志”——兼论中国诗学“开山的纲领”[J]. 文学遗产, 2005(03): 79-91.
- [6] 金涛声点校. 陆机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7]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8] 曹旭. 诗品集注(增订本)[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 [9] 戴明扬. 嵇康集校注[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 [10] 陈鼓应. 庄子今注今译[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11] 余嘉锡笺疏. 世说新语笺疏[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 [12] 李善注. 文选[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 [13] 杨明照校注拾遗. 增订文心雕龙校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 [14] 王葆玟. 正始玄学[M]. 济南: 齐鲁书社, 1987.
- [15] 陈鼓应. 老子注译及评介[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16] 周振甫. 周易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1.
- [17] 陈祚明. 采菽堂古诗选[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 [18] 洪兴祖. 楚辞补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The pursuing experience of Ji Kang in his poems

YE Dangqian

(School of Chinese and Literature,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Anqing 246052, China)

Abstract: Ji Kang paralleled images and combined the history material in the poems to express his thoughts. On the surface he showed the immortal and reclusive thought. In essence, Ji Kang intended to explore the harmonious society. Not only did he inherit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but also think the way of Lao Zi and Zhuang Zi. The Poem expressed the psychological process of himself from the ambition that natural freedom could not be realized. It is the dual variation between noble thought and reclusive idea.

Key Words: JiKang; Poem to Expressing Thoughts; noble thought; reclusive idea

[编辑: 胡兴华]